

# 论太平洋联盟兴起的外部动因与内部约束

##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芦思姮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北京 100007)

**【摘要】**近年来,太平洋联盟在拉美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势头强劲,成为该地区探索区域性长效合作与深度融合的重要尝试。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看,这一新制度被创设的主要驱动因素在于外部动因、内部约束两个维度。太平洋联盟成员国在发展模式、政策偏好等层面的趋同性不仅有利于在新制度创设阶段降低交易成本,也助推了制度运行阶段形成相对合理的利益分配结构,从而激励各国在集体行动中维系组织合作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太平洋联盟的这些初始制度禀赋,更能够契合中拉产能对接进程中资本“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切实要求。

**【关键词】**太平洋联盟; 新制度经济学; 预期收益; 集体行动

**【中图分类号】** F114.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860 (2017) 04-0010-08

### The External Motivation and Internal Restraint of the Rise of the Pacific Alliance: Based on a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LU Si-heng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acific Alliance shows strong growth in Latin American integration process, and becomes an important attempt to explore regional long-term cooperation and deep integration. 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 mainly driving factors of this new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creation depend on two dimensions: external motivation and internal constraint. The four member states have a convergence inclination in such aspects as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policy preferences, which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 creation stage, but also to form a relatively reasonable structur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in the operation phase of the system, so as to encourage countries to maintain the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y for organiz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collective action. In addition, these initial institutional endowments of the Pacific Alliance are able to meet mor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capital “bringing in” and “going out” in the process of docking on production capacity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Keywords:** Pacific Allianc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Prospective earnings; Collective Action

21世纪步入第二个10年以来,作为拉美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兴力量,太平洋联盟异军突起。自其成立伊始,无论是从经济体量来看,还是就增长活力而言,均传递出利好信号。这一由智

利、秘鲁、墨西哥和哥伦比亚4国共同发起并建立的新区域合作制度性安排,成为当前拉美探索区域性长效合作与深度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尝试。

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拉美

收稿日期: 2016-12-20

作者简介: 芦思姮(1987-),女,北京人,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 拉美经济、区域一体化。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拉关系及对拉战略研究”(ZDA067)子项目“中拉整体合作研究”的阶段成果。

区域一体化组织呈现日益分化的趋势：由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委内瑞拉组成<sup>①</sup>的南方共同市场（以下简称南共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逐步走向越发封闭而僵化的道路，不仅成员国之间内部贸易争端频仍，且在拓展区外经贸关系方面进展缓慢，几近停滞。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太平洋联盟得以循序渐进且富有活力地拓展区域合作领域，尤以亚太地区为依托，展现出外向开放型发展的积极姿态。

### 一、太平洋联盟发展的基本面透视

2011年4月，在秘鲁时任总统阿兰·加西亚的倡导下，秘鲁、哥伦比亚、智利、墨西哥4国举行了第一次首脑峰会，共同发表了《利马宣言》，自此拉美太平洋联盟宣告成立。2012年，4大创始国首脑正式签署框架协议，这标志该组织步入制度

化轨道。框架协议签署后的3年时间里，先后经过墨西哥、秘鲁、智利和哥伦比亚国会审议通过，并于2015年7月20日生效。

从静态状况看，太平洋联盟四国覆盖人口2.16亿，约占拉美地区总人口的35%<sup>[1]41</sup>。2015年，4个成员国的GDP总和相当于地区总水平的1/3<sup>②</sup>。从动态状况看，太平洋联盟在贸易领域的重要性尤为显著，可以与南共市进行比较。图1显示了两个组织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进出口贸易总和占拉美地区贸易总额的比重情况。可以看出，太平洋联盟4个成员国进出口总和占比始终保持在40%以上，而南美最大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南共市与前者差距最大可至15个百分点。在这5年间，太平洋联盟对外贸易总额占比呈现稳定上升趋势。相比之下，南共市不仅在存量与增量上处于劣势，且占比波动性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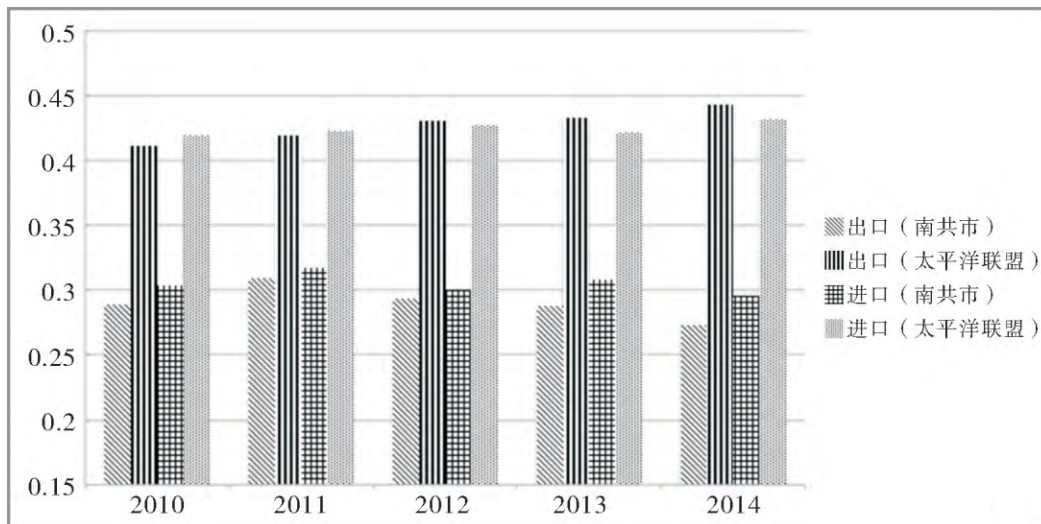


图1 太平洋联盟和南共市进出口贸易额在拉美地区占比情况（2010—2014）

注：鉴于世界银行对委内瑞拉2014年贸易数据缺失，故图表中南共市数据未包括成员国内委内瑞拉。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绘制。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

自2013年以来，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拉美各国，尤其是南美国家面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下跌的困境，无疑对各国过度单一的经贸结构形成挑战。在这种逆势下，拉美地区经济发展形势发生分化：一方面，南共市主要国家，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都未能避免经济陷入衰退周期，尤其是巴西、委内瑞拉不仅出现负增长，且经济的长期萎靡不振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社会危机。这种连锁的“传染效应”更使得两国的前景雪上加霜。然而，太平洋联盟4国在不利的的外部环境下尽管也遭受了

相当程度的冲击，但并未如南共市诸国那样跌入谷底，各国宏观经济总体表现坚挺稳健，增速超过拉美平均水平。

### 二、太平洋联盟创设的外部动因——预期收益维度

新制度经济学视觉下，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制度是人为了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创造的种种限制。制度由正规的限制（规则、法律和宪法）及非正规的限制（行为守则、公约和自我约束）

构成<sup>[2]3</sup>。这位新经济史学的开拓者,将制度变迁的驱动因素置于经济人对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框架内,指出一项制度之所以被创设,其动因基于在现存制度安排下个人期望的预期收益。

将这一动因具体到太平洋联盟可以看出,与世界范围内诸多经典的区域合作组织案例不同,太平洋联盟存在其特殊之处,即实现成员国之间要素的自由流动并非该组织建立的最主要诉求。这可以归因于两方面的解释:其一,在该联盟成立前,4国中的大多数已经互相签署了双边或多边的自贸协定,因此在太平洋联盟框架协议及其附加协议生效后,成员国之间免税条款对各国扩大区内贸易额的影响效应相当有限;其二,从传统区域经济效益分析框架来看,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sup>[3]35</sup>,太平洋联盟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远大于贸易创造效应。也即是,通过这一机制扩大内部商品贸易自由流动提高国际竞争力、增进各成员国福利的预期不甚乐观。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区内贸易量在其贸易总量中的占比,普遍低于域外其他经济合作组织的比率。而太平洋联盟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更为缺乏,区内出口贸易占比仅为拉美平均水平的1/7<sup>[4]</sup>。由此可见,4国经贸互补性不高。尤其是,智利、秘鲁、哥伦比亚3国均为资源出口型国家,而墨西哥虽然以较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为主要贸易产品,但在北美自贸协定(NAFTA)的巨大牵引力下,该国的经贸重心始终无法过多地向拉美地区转移。于是,太平洋联盟这一新制度安排的创建,并不会对内部各国的福利增进产生过多影响。那么,为何4国仍然对成立该组织产生强烈诉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一项新制度安排之所以被创设,是基于某些外在变化逐步促成了利润的形成。理性经济人对这一收益的可获性予以了充分地预期,希望能够通过新制度的建立,将这些外部收益内在化,以此提高运行效率,达到帕累托最优<sup>[5]87-97</sup>。

鉴于此,笔者从4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变化作为主要切入点,对太平洋联盟成立的动因提供一个解释维度:进入21世纪以来,亚洲太平洋多国迅速与拉美地区深化经贸往来,并在这一过程中对整个区域的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强劲的助推作用。在这一利益所惠及的所有拉美国家中,太平洋沿岸诸国无疑

是最大的受益者,智利、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亚太地区所蕴藏的潜力。可以认为,这种新趋势顺应了近年来国际经贸格局的变化:一是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规制能力逐步下降,自由贸易协定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盛行;二是在当今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的大背景下,尤其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亚太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发展的新增长点。基于这两点,智利、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4国开始以更加务实而开放的政策立场,通过签署双边自贸协定,积极拓展与亚太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的关系,力图推动经济关系多元化发展。这一新动向不仅能够使4国通过降低对传统目的地欧美国家的依赖度,增强本国经贸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而且可以使其充分利用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红利,为本国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动力。

对4国而言,密切与亚太新兴国家经贸关系产生了丰厚的收益,是促成各国2003年至2008年繁荣周期的重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优势要素在2008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后表现得更为显著。因此,维系并进一步获取这一收益,成为推动太平洋联盟在2011年成立的重要变量。

图2表示出,在2004年至2015年期间,太平洋联盟4国对亚太地区商品贸易总额占各国对外商品贸易总额的比重情况(左轴)。静态层面,亚太主要国家对智利、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4国的贸易份额举足轻重:墨西哥对亚太区域内贸易呈现高度依赖性,占比超过80%。而智利、秘鲁、哥伦比亚3国的亚太区内贸易份额尽管未及墨西哥,但是也达到了40%以上的高水平。动态来看,这12年间,4国对亚太地区经贸依赖程度与日俱增,尤其是受益于双边自贸协定的正向溢出,智利和秘鲁两国表现尤为活跃,10余年间平均增幅逾10个百分点。这种强劲趋势发端于太平洋联盟成立之前的经济繁荣时期,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期间,即该组织成立前2—3年间,变得更为显著。从图2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这一时期4国与亚太国家的贸易占比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浮。基于此,4国清楚地意识到了拓展亚太市场对其降低经济脆弱性风险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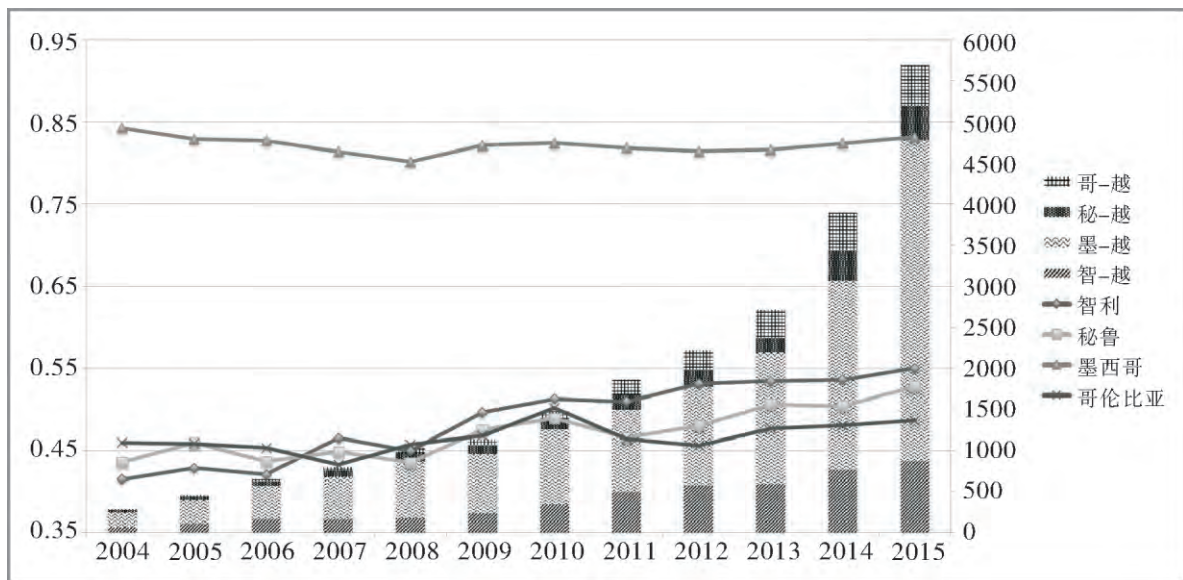


图2 太平洋联盟各国亚太区内贸易占比及与越南双边贸易情况 (2004—2015)

注: (1) 亚太地区选取10个代表国家,分别是美国、加拿大、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

(2) 贸易额单位: 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绘制, 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Comtrade<sup>③</sup>。

从国别来看,在4国所开拓的中小型新兴市场中,同越南的双边贸易增长最为强劲。如图2所示,12年间,4国与越南的双边商品贸易情况(右轴)取得了长足进展,年均增速逼近30%。不可否认,越南已经成为4国亚太区内贸易中名符其实的优质潜力股和新兴增长点。与越南的双边贸易不仅未明显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反而具有明显的正向外溢效应,成为4国从遭受重创的经贸形势中实现较快复苏的外部利好因素。

此外,中国作为4国第一或第二大贸易伙伴<sup>④</sup>,是近年来各国对外经贸关系变化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图3反映出2004年至2015年期间,太平洋联盟4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变化情况(左轴),以及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占各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右轴)。可以看出,中国与太平洋联盟4个成员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在10余年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鉴于出口结构中大宗商品占主要比重,智利、秘鲁、哥伦比亚3国对华贸易具有高度互补性。而墨西哥的情况却更为复杂,中墨在贸易结构上的相似性会导致两国产生一定程度的竞争与摩擦,但近10年来,两国双边贸易总额稳步攀升已成为不容小觑的趋势。密切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已日益成为墨西哥拓展亚太市场的重点。

需要指出的是,拉美太平洋沿岸国家之所以能够在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后实现较快的经济复苏,是与当时同中国双边贸易的巨大助力分不开的。如图3所示,2009年,4国与中国双边贸易额略有下浮,但第二年就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增幅,尤其是中国对受到美国经济波及最为严重的墨西哥,拉动作用最为明显。2010至2011年期间,4国经济已经基本恢复平稳。

21世纪以来,这种对外经贸关系新变化所带来的收益与日俱增,对各国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日益显著,智利、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对进一步巩固并增进这一预期利润产生了强烈诉求。4国深知,仅依靠“单打独斗”和仅一国有限的经贸体量,是无法将这一利益最大化的,更无法实现制度创新所产生的收益递增效应。要想在全球化新格局中把握机遇,尤其是深化与世界其他区域组织的合作,需要依托更大规模的区域制度安排,整合市场实现“深度融合”,充分利用经贸互补优势,以更具竞争力、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整体姿态“着眼于世界,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敞开大门,从而构筑拉美与亚太之间全面合作的桥梁”<sup>[6]4</sup>。这种利益考量,是促成太平洋联盟这一新制度安排应运而生重要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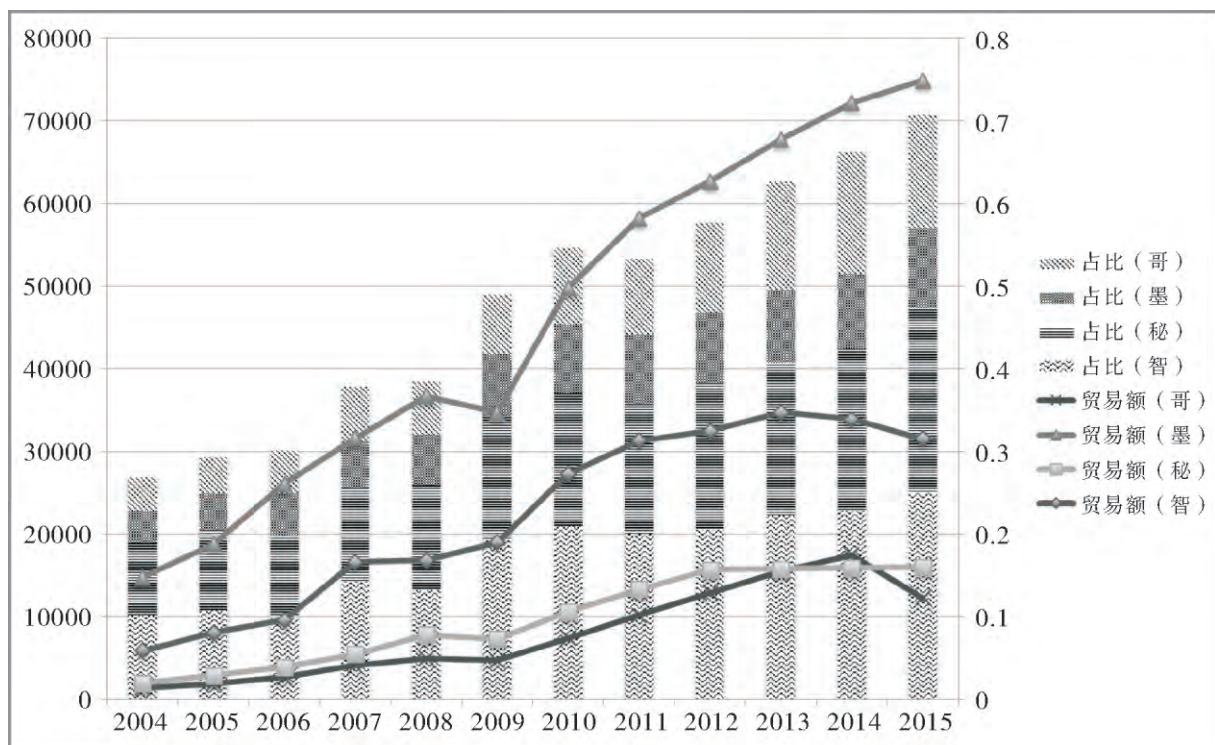


图3 太平洋联盟四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情况(2004—2015)

注: 贸易额单位: 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绘制, 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Comtrade 数据库。

为了更加明确这一考量因素, 笔者分别以东盟、美国、中国为例, 阐述 4 国通过太平洋联盟这一制度创新, 不仅在深化与亚太地区经贸关系方面巩固了既得利益, 而且正在逐步收获制度化合作所产生的、递增的规模收益。自 2016 年 5 月起, 太平洋联盟国家开启了与东盟对话进程, 主张在各自一体化平台基础上, 共同建立合作框架, 以充分应对经济全球化, 特别是当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的国际经贸格局。正是依托了太平洋联盟这一制度安排, 4 国才能够与东盟各国在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基础上, 共商改善贸易投资便利化、实现中小企业互联互通、加强民间交流、降低社会贫富差距等议题。不可否认, 这些发展目标的实现, 仅仅依靠“单枪匹马”是无法达成的。这种规模收益在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通称 TPP 协定)谈判时, 同样有所体现。在这一进程中, 智利、秘鲁、墨西哥将太平洋联盟这一规制作为 3 国行动协调与利益协商的平台, 不仅实现了“抱团”发声, 也增加了与发达国家据理力争、捍卫自身权益的筹码, 使美、日等发达国家在制药业知识产权保护、农产品市场准入等方面, 做出了相当程度的妥协与

让步。需要指出的是, 3 国正在积极寻求将哥伦比亚拉入到 TPP 框架中, 因为这会更加有助于太平洋联盟作为一个整体, 在今后 TPP 机制运行中形成合力, 进而代表拉美地区的共同诉求在国际经贸新规则制定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在与华关系层面, 借助太平洋联盟的这一区域合作实体, 成员国之间得以将经济、贸易、投资、关税、金融等领域的合作予以制度化规范, 这会有助于各国在重大议题保持立场与偏好整合的基础上, 更好地根据中国国内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转型要求, 进行更加灵活的调整。此外, 在当前美国特朗普新政府执政为 TPP 前景蒙上阴影的背景下, 中国在亚太地区积极倡导的经济合作一体化, 如 RCEP、FTAAP 等, 对 4 国以自由化、开放化、多元化为特质的经贸政策立场发展尤为关键。毋庸置疑, 如果以太平洋联盟这一制度安排为依托, 4 国在深化亚太区域合作一体化进程中, 会远比单独一国更有作为, 更具影响力。

### 三、太平洋联盟创设的内在约束——预期成本维度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促成新制度创立的两大因

素,一是由外在变化产生的预期收益,这一点已经在上文予以阐释,二是位于利益权衡另一端的预期成本<sup>[7]97-112</sup>。关于成本要素,笔者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 (一) 制度创建成本

在诺思看来,制度是一种社会的博弈规则。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一项制度安排能否实现,取决于参与博弈的各方社会参与人所秉承的共同要素,例如对于博弈方式和结构的共有信念。即是说,区域一体化的制度选择与演化,是通过在利益协调中寻求共通点实现从一种均衡向另一种均衡的移动。在拥有自主选择权的各国创设新制度过程中,谈判协调产生的现实成本是最直接的一道关卡。此时,参与谈判的各方博弈者初始发展禀赋的趋同程度便显得尤为关键,因为对这一套博弈规则达成共识所必需的成本,能够决定各国是否能够以较低的代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取得高效的利益契合。

就成立太平洋联盟而言,4个成员国拥有相近的发展模式和政策偏好。这种趋同性对降低创设新制度所产生的成本具有强烈的正向溢出。共同的利益诉求使4国自筹建太平洋联盟伊始,便能够在各领域的交涉谈判协调中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相对一致的利益共识。具体地说,在拉美地区,智利、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均是政治民主制度最为稳健<sup>[8]4-5</sup>、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营商环境较好<sup>[9]14</sup>的国家。政治环境相对稳定,为经贸政策的连续性打下了良好基础;4国均奉行自由开放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与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对外进出口依存度高,致力于在经贸关系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与地区内外各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动对外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

在对外政策偏好方面,重视发展同亚太地区的经贸关系是4国最为一致的利益契合点。在这一方面,智利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过去25年来对外政策一贯坚持的立场,该国始终将外贸发展重心向亚太地区倾斜<sup>[10]125</sup>,与其他3国相比,智利的“亲亚太”立场多了一抹政策传统色彩。而哥伦比亚,作为拉美唯一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都有出海口的国家,传统上经济发展重心偏向大西洋一方,因此在拓展与亚太关系方面相比其他3国步伐相对滞后,既未能如愿加入APEC<sup>⑤</sup>,目前也无缘参与TPP。但是近年来,鉴于该国政府对“亚洲是全球

经济新的发动机”<sup>[11]</sup>的现实认知,哥伦比亚将这一地区视为战略重点,与亚太地区加强经贸合作的意愿和利益诉求日益强烈。值得指出的是,政策偏好上的相似性,同样体现在近年来4国在经贸发展政策和理念的立场更加务实——拓展多元化的对外贸易关系。如上文所述,鉴于亚太地区各国近年来经济的强势表现,以及在区内出口商品结构中比较优势的彰显,亚太国家顺理成章地成为了4国经贸关系多元化政策中的重要角色。

#### (二) 合作组织的长期运行成本

一般而言,区域一体化进程是建立在两个以上国家的行为,往往牵涉到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另一个基本概念——集体行动。一个成功的一体化案例,可被视为成员国集体行为所产生的积极成效。作为集体行动的区域一体化制度,其所产生的影响是公共的,故具有外部性。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奥尔森认为,导致集体行动困难的原因除了人数众多造成协调成本过高以外,最重要的还在于成员之间的收益分配不对称<sup>[12]866-874</sup>。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在博弈过程中将可能由于缺乏激励去承担合作行动中产生的责任,故而采取“搭便车”行为,“坐收渔翁之利”。此外,制度带给人们的报酬决定了制度演进的轨迹:当收益递增普遍发生时,制度变迁不仅能够得到巩固和支持,且能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环环相扣,实现良性发展;当这种收益不能普遍发生时,变化方向便会朝着非绩效发展,如同进入恶性循环,且愈陷愈深<sup>[7]97-112</sup>。

在分析太平洋联盟时,可将其与南共市进行对比。从制度性公共产品分配角度,尽管太平洋联盟和南共市成员国都未经历大规模的扩容,但成员国之间初始禀赋的差异,导致这两大制度安排在实现和维系成员国之间合作时产生的成本—收益结构大相径庭。

如前所述,太平洋联盟4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偏好相似,即将接纳的第五个成员国哥斯达黎加也与4个创始国的利益诉求拥有诸多共性。因此在采取集体行动时,利益的高度契合使各国更有意愿为促成集体合作,去承担相应的责任或做出某些让步。成员国之间在成本优势基础上,有意识地构建了一系列制度化的“契约关系”,从而使利益分配机制实现最大限度的均衡,故大大规避了“搭便车”问题。

从制度选择来说,太平洋联盟顺应全球区域一体化浪潮,采用了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依托的、更为灵活的区域合作形式。成员间不必为让渡对外关税政策制定权而耗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协调统一立场。这种制度设计对于民族主义、民众主义意识过强,对主权问题过于敏感的拉美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优质选项。可以认为,太平洋联盟这些特质会优化并完善内部利益分配,这将有助于降低组织维系合作的运行成本,并使其沿着这一正向溢出轨迹继续下去。事实上,自 2011 年以来,在低运行成本优势下,太平洋联盟一体化制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该组织在贸易、金融、科学技术、教育、旅游等各个领域制定了一系列规制,旨在促成成员国之间的制度化合作,在共同承担责任与风险的基础上,实现了更加公平分配和共享资源的目的。譬如在贸易便利化方面,规范了成员国之间的金融、服务、海运、通信和电子商务等领域的贸易准则,强化了贸易监管合作,通过简化海关手续、消除不公正的技术壁垒等方式,为地区内部的自由贸易提供了司法保障;在金融合作领域,4 国一定程度上让渡了主权,力图整合各国股市,形成统一的一体化市场,并进一步深化资本运作。

相比而言,近年来南共市内部摩擦不断,成员国之间经济体量、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差异过大,导致该组织维系合作的成本过高,且成员国之间收益分配严重不均。作为关税同盟,在商议制定统一对外关税时,为了协调各方利益付出了过多的代价,且“后遗症”遗留至今。而巴西作为地区大国,应该肩负起相应责任,提供必要的制度性公共产品,具体在对外关税问题上,若巴西按照自身意愿制定统一的高关税,就应该构建相应的机制,为因经济结构相对落后而遭受更多损失的小国进行补偿,通过平衡成员国利益分配实现一体化合作的国家平等核心宗旨。

对此,巴西也曾进行过相关的努力与尝试,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2006 年南共市结构一体化基金的设立。这是巴西主导的第一个旨在降低集团内部各成员国之间不平衡利益分配的补偿机制<sup>[13]</sup>,但最终由于资金短缺,其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投入量远低于维持机制运行所必需支付的成本,因此这一机制多年来收效甚微。乌拉圭、巴拉圭由于长期无法获得足够的利益补偿,对集团过高的对外关税怨声

载道<sup>[14]23</sup>。可以看出,在南共市中,大国无力承担维系组织内部合作所产生的相应的责任,导致经济体量差异过大的成员国之间的成本—收益结构愈发不合理,最终造成了南共市内部利益分配机制失灵,使该机制在制度路径依赖的作用下,沿着恶性循环的轨迹逐步走向封闭低效的深渊。

### 结语

随着亚太地区广阔市场潜力的不断开发,在中长期的发展轨迹中,预计太平洋联盟仍将享受这一发展红利。新时期、新形势下,这一新制度安排的创建与演进能够为我国探索深化对拉合作的着眼点与契合点提供如下启示:

其一,中国可充分利用太平洋联盟向亚太地区倾斜的对外政策取向,搭建与拉美地区开展整体合作的桥梁与纽带。

其二,近年来,中国力图在加速亚太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进程中拥有更大作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相继成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倡议(RCE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步入正轨。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在亚太地区范围内赢得更为广泛的响应与支持。如前所述,太平洋联盟成员国均奉行并捍卫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市场开放等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所倡导的这些进程符合其发展观念与长远利益。因此,我们可能将以较小的协调成本赢得该次区域组织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事务重要性的认同与拥护。

其三,由于贸易互补性强,近 10 余年来,拉美地区大部分国家以及我国保持着高度紧密的经贸往来,但这一现状也导致域内各国对自身越发倾向于初级产品部门的单一经贸结构产生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将生产结构转型升级提上议事日程,旨在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国际竞争力,以摆脱经济的脆弱性。针对拉美国家的这一诉求,在中拉整体合作框架下,我国正着眼于深化对拉投资和金融领域的联系。值得指出的是,同拉美其他次区域组织相比,太平洋联盟国家不但保持着持续稳健的增长活力,而且在市场准入、投资便利化条件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在这样的条件下,太平洋联盟的这些初始制度禀赋,更能够契合中拉产能对接进程中资本“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切实要求。

## 注释

- ① 2015年7月,在南方共同市场首脑会议上,玻利维亚被接纳为第六个成员国,但是在合法性层面上,该国尚需巴西和巴拉圭议会批准方可正式成为该组织成员国。
- ② 参见世界银行2015年国别数据库: <http://data.worldbank.org/>。按照现价美元计算。
- ③ 根据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拉美和亚太各国2004至2015年商品贸易数据计算而得,参见Comtrad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http://comtrade.un.org/labs/BIS-trade-in-goods/?reporter=826&year=2014&flow=2>。
- ④ 对智利和秘鲁而言,中国是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分别于2009年和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智利和秘鲁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详情参见智利经商处“智利对外贸易情况”,中国驻智利大使馆,2012年5月11日, <http://cl.mofcom.gov.cn/article/ddgk/zwjingji/201205/20120508117034.shtml>,以及秘鲁经商处“中秘双边经贸关系简况”,中国驻秘鲁大使馆,2015年5月15日, <http://pe.mofcom.gov.cn/article/zxhz/hzjj/201505/20150500972651.shtml>;对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来说,中国是第二大贸易伙伴,详情参见墨西哥经商处“墨西哥对外贸易简况”,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2014年7月20日, <http://mx.mofcom.gov.cn/article/ddgk/zwjingji/201407/20140700668011.shtml>,以及中国商务部“哥伦比亚国别报告”,2016年3月5日, <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qikan110209.asp?id=8047>。
- ⑤ 哥伦比亚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曾多次提出加入APEC,但终因该组织暂停扩容,申请被搁置。

## 参考文献

- [1] CEPAL, La Alianza del Pacífico y el Mercosur Hacia la convergencia en la diversidad [R]. 2013.
- [2]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0.
- [3] 柴瑜、孔帅. 太平洋联盟: 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发展 [J].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4).
- [4] Cepal, La Alianza del Pacífico y el Mercosur. Hacia la convergencia en la diversidad [R]. 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Naciones Unidas, noviembre de 2014.
- [5] 道格拉斯·C·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M]. 格致出版社, 2014.
- [6] Alianza del Pacífico, Abecé, Informe de VII Cumbre Alianza del Pacífico [R]. 23 de mayo de 2013.
- [7]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5, No. 1, 1991.
- [8]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Democracy Index 2014 Democracy and its discontents [R]. 2015.
- [9] The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2014 Understanding Regulation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s [R]. 2015.
- [10] Manfred Wilhelmy, La trayectoria de Chile frente a la región Asia - Pacífico [J].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2010 (167).
- [11] 参见《América Economía》报道文章: China y Colombia en conversaciones para construir una vía férrea que una el Pacífico y el Atlántico [N]. [2015-08-10]. <http://www.americaeconomia.com/negocios-industrias/china-y-colombia-en-conversaciones-para-construir-una-ferrea-que-una-el-pacifico>.
- [12] Mancur Olson, Increasing the Incentive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5, No. 4, 1971.
- [13] 参见南共市官方网站. [2016-07-10]. [http://www.mercosur.int/innovaportal/v/385/2/innova.front/fondo\\_para\\_la\\_convergencia\\_estructural\\_del\\_mercosur\\_focem](http://www.mercosur.int/innovaportal/v/385/2/innova.front/fondo_para_la_convergencia_estructural_del_mercosur_focem).
- [14] 温大林. 当前拉美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制约因素 [J]. 拉丁美洲研究, 2013 (3).